

乡镇书写与通往宏大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读何雨生长篇小说《十月风生》

王夔

大约在十年前吧,何雨生在闲聊中跟我谈起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我和何雨生都是黄桥镇人。八十多年前,黄桥镇发生过中外闻名的黄桥战役。何雨生说,他的长篇与黄桥战役相关,他并非想对黄桥战役进行历史书写,在他的计划中,黄桥战役只是背景,他要以一个说书人的口吻,撩开历史的另一层面纱。

十年之后,终于迎来了他的《十月风生》。

我二十八岁时离开小镇,去了县城,再去了设区市。何雨生几乎没有离开过黄桥,近十数年来,除沉迷于文学创作之外,还搞起了黄桥历史文化研究。他文字里的“如数家珍”“但手熟尔”,却是我归不去的故乡。在《十月风生》里,我触摸到了故乡的骨络、血脉。

面对陈旧的历史,我们的笔如何能使它生动、有趣,使它从沉闷的书写中跳脱出来,这是许多作家面临的难题。何雨生长久以来浸淫史志,对于历史,有他独到的认识。我们通常对历史的认知,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皇

汉武,是诸侯与国家,对于常人来说,它浩瀚无边。对于一个乡镇呢?对于一个在乡镇中生活的普通人呢?他所见所闻的历史,又会是怎样的风貌?何雨生选择了这样一个切口,因此他的小说,借了说书人的口来开篇。当然,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书写必然是有策略的,而非历史的简单陈述,正如萨特所言:过去相对于被选择的目的是其所是。

我一直以为,乡镇,作为农村和城市中间的那个点,可能被中国作家普遍忽略了。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丽军有同样的看法:百年乡土中国文学绝大多数是以乡村为单位,聚焦于农民生存悲劇与苦难命运的、展现乡村民俗民风的乡土文化审美书写。关于乡镇的乡土文学,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即使偶尔书写的“乡镇”,也是文化批判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空间表征。

浙江师范大学的徐勇教授认为:乡镇时空之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地方在于它的混杂性和敞开性。它没有城市空间的那种感受时代风气之先的迅捷,也不像乡

村时空那样滞缓,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和“中间地带”。

乡镇书写既区别于乡村书写又区别于城市书写,这种“中间地带”,恰恰是写作的难处。而面向难处的写作,才是上天分给作家的开垦地。何雨生是如何介入这个“中间地带”的呢?他写牌儿经:一副纸牌,条、万、饼每种花色四张共一百零八张;他写灯会:那盏灯,仿佛来自前世,掠过众人头顶,跃上高空,一路遮天蔽月;他写水龙会:各家水龙咸集,皆排列于转水墩西岸。这些解放前黄桥镇上的往事皆在何雨生胸中,待他写《十月风生》,便纷沓来跃陈于纸上。加上大量方言民谚的精准使用,使得《十月风生》有了布满肥料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枝一叶,必然丰满甜美。

吴不会、吴不弃兄弟便是从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两片叶子,何雨生写他们的爱情,他们多舛的命运,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沉浮。在乡镇书写的土壤上,个人的选择往往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非A即B的,吴不弃的悲

剧,就是个选择性错误,而在战争面前,兄弟之间的感情以及兄弟与细细的爱情,才变得难以抉择。何雨生在战争的硝烟中,找到了人性,他要让我们透过硝烟看人性。我得承认,他是成功的,我们内心的悲悯,在那一刻,柔软得一塌糊涂。如小说中所写:凉月霜空,山河苍茫;天地无涯,人如粒沙。

当然,《十月风生》也不是完美的,它多向度的叙事脉络在丰富了小说的同时,也给读者制造了迷宫。但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文学天地,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宏大叙事时,我们要面对怎样的土壤。

在中国,乡镇像一个透境。向前,可以看到放大的城市;向后,可以看到缩小的村庄。它是农村和城市中间的必经通道,是文学书写的薄弱环节也是文学书写的困难领域。它虽小,相比城市和乡村,在可书写的精神向上,它有着更大的包容量。在宏大叙事日渐式微的今天,乡镇书写,或许是通往宏大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从来没有离开

祁文斌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的遗孀文洁若,也是一名翻译家和作家,但她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却是萧乾的妻子。萧乾的“宗教”是文字,文洁若的“宗教”是萧乾。她说:“我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

1999年2月11日,萧乾去世。而文洁若先生迄今已94岁高龄,仍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

由于两个子女都不在身边,文洁若独自一人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处老居民楼里。文洁若家,萧乾的大幅照片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除此以外,执拗的文洁若还保持着一个奇特的习惯:直至今日,但凡文朋书友之间酬赠应和,文洁若往往将自己的著作与萧乾的著作一同赠送,并且盖上他们俩人的印章,如影随形。

或署上他们俩人的名字,作为落款!

尽管二人夫妻情深,还曾合译过多部英文作品,但仍难免让人诧异、惊讶。伴侣之间,一方已去世多年,另一方仍念念不忘,这并不奇怪,但绝对没有文洁若这种做法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洁若退休前的工作单位。一次交谈时,社里一名年轻编辑按捺不住地问文洁若:“文老师,您这么做有什么特别寓意吗?萧老毕竟已离世很久了。”文洁若却泰然自若地说:“我赠书给朋友,也是萧乾先生赠书给朋友。自从与萧乾先生共同生活之后,他就一直留在我心底,从来没有离开。”

原来,在无尽岁月的更迭中,萧乾先生已悄然成为文洁若生命的一部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两个人已经融为一体,如影随形。



《我为他们照过相》(张昌华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

张昌华是资深出版人,20多年来致力于文化名人随笔创作,先后出版《曾经风雅》等10部作品,荣获第三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奖”。如果说“一位老人就是一部历史”的话,那么,张昌华撰写的《我为他们照过相》这本书,则犹如一缸陈酒,“味道”更深更久更香醇。本书集合冰心、巴金、钱锺书、季羡林、茅以升、钱伟长、秦怡、黄宗英、刘海粟、吴作人等102位文坛前辈、科学巨子和艺术名家的影迹,以一手资料独家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状写风貌,叙说缘分,亦文亦史亦影像,剪辑出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风貌。

推荐人:郁春红

书香影

7月11日,第十一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五天时间里,书展在1个主会场、132个分会场、2个线上分会场同步举办。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汇聚,8万多种优秀出版物云集……今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本届书展以“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为主题,用一届成功的读书盛会弘扬红色文化,倡导红色阅读,致敬建党百年。

陈俨 摄



旧书重读似春湖

刘敬胜

上高中时,在学校旁边有一家旧书店,很小的两间,架子和地上摆满了一摞摞的旧书。买书,需要亲自翻找。店主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头发和胡须花白,背有点驼,戴金边眼镜,双目炯炯有神,实实在在的“腹有诗书气自华”。

那时我住校,每次从家里回来,拿着为数不多的零花钱,总会到书店里转转,看看有没有心仪的书,价格便宜,就买下来,带到宿舍看。

有一次,老人对我说,他淘了一批廉价书,有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中外名著,问我要不要?他说每本1元钱,如果我要,可以给我留着。他从柜台桌子底下的鱼鳞袋子里拿出来几本,书皮上都落了一层

灰。我把两周的零花钱全部用光,分批挑选了十本。

回到学校,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白鹿原》翻看,书页已经泛黄,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小字:往事思思细如雨,旧书重读似春湖。毛笔写的,隶书,中规中矩,勾画了。不知这副对联上何处,看完,怦然心动,猜想,写对联的和写字的都应该是爱书的人。

毕业后的一次聚会,一位经常去旧书店买书的同学告诉说,老人看我经常来看书,又没有钱,把这些书按照进价卖给了我。同学买的是两元一本,不还价。我想去谢谢老人,却发现,物非人非,书店换成了服装店。很遗憾,我再没见过他。

多年后,读汪曾祺的《榆树村杂记》,在《折难老》中,他

自述,在七十三岁生日,曾写了一副小对联:往事思思细如雨,旧书重读似春湖。才知道对联出自汪老的手笔。汪老说对联是纪实。他还说他喜欢看杂书,看过的,再看看,便有了新发现。他专门举例说,几本笔记里都记过应声虫,最近看几本诗话,才知道得应声虫病是会要人命的,而且这种病会传染!使他对应声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汪老说的旧书应该是读过的书,重读了,才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读过的书,我有时会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有时也会随意地丢在床头、沙发上。偷得浮生半日闲,靠在沙发上,泡一杯香茗,捧一书在手,在作者的灵魂里舞蹈。书的内容大都了然于胸。其中的酸甜苦辣,情节的波

折、高潮大略已经领略。重新再读,心中就会像春天的湖水一样波澜不惊。不惊,不是无感觉,无味道。旧书重读需要琢磨,细读,反刍一样,慢慢消化。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不是读不懂,只是重读的次数不够多,心不够静。次数够了,便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与地坛》,作为我的床头书,已经读过不下二十遍。从少年感觉此书无味道,到青年时,仅仅感觉母爱的伟大,直到中年,因为母亲的因病突然去世,让我感觉到生命的无助,和亲情的难以割舍,随着经历的成长,每次读都有不同的感觉,每读一遍,都多了对人生的思考。

旧书重读似春湖。说的是读书,其实也包含人生!

字俱碧鲜

耿艳菊

下班的地铁上,我站在临窗的位置看一本书,疲惫感再加上拥挤的人群,有些心不在焉。

突然,眼前豁然明亮了起来。地铁上到了地面,这一趟地铁有五站都是在地面上行驶的。虽然每天都会乘坐这趟车,但这种熟悉的明亮感依旧惊艳到了我。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人间大地到处都生长着茂盛的植物,浓浓的绿意翻滚着,简直要沸腾了似的。这五站要经过一片浓密的树林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河流两岸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翠绿的草甸,地铁刷刷地迅速向前,而人的眼睛和心灵都沉浸在一场浩浩荡荡的绿的盛宴里。

五六站过后,地铁又到了地下,窗外又恢复到漆黑的样子。这时,身心的疲惫和沉闷也悄无声息地被轻松宁静赶走了,陡然间清清爽爽的。再低头去读刚刚翻看的那本书,竟是不同的了。是人的眼睛在绿意里清洗过的缘故吧,那书上的文字也跟着绿意婆娑,很是生动了。

如果用一个词语描摹形容一下这种感受,“字俱碧鲜”再恰当不过。这是张岱的词语,他写到:“天镜园浴凫堂,高槐深竹,樾荫千层,坐对兰荡,一泓深之,水木明瑟,鱼鸟藻芹,类若乘坐。余读书其中,扑面风来,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

车窗外的风景也许赶不上天镜园,但好的风景异曲同工,的确会改善心境,即便平淡的一本书,也能发现其两三处明媚生动的地方。

赏心悦目,宁静清新,雅致美观,此类美好的读书环境,是大众都喜欢的,得天独厚,拥有加分的优势。然而,普通人的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有多少悠悠活,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有多少悠悠活呢?常常是在为生存奔波忙碌的空隙里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时间匆匆忙忙地看几眼书,把多年前的梦想和习惯勉强坚持着,不迷失于粗砺的现实罢了。

因此,我喜欢那些自身拥有优势的文字,是的,就是本身的字俱碧鲜,鲜活的、生动的、明媚的……不需要借助外力,它本身就具有迷人的风采,本身就是一片风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都能让人沉下心来,给人以宁静清凉,给人以轻松妥帖。如良师益友,默默温暖。如酒逢知己,沉醉其中。

好文字如此,细想想,人的一生也当是如此才好。走到哪里,都是一道自信鲜亮的风景。不需要外力,不需要哗众取宠,不需要依靠和故意为之,到什么样的环境,遇上何样的境遇,都能从容优雅应对。

钱锺书过世后,我写过一篇《走近钱锺书》,我非但始终未能“走近”,去府上三次竟无一面之缘,遑论照相了。遗憾或也是一种美,值得一记。

钱先生的耿介绝俗与他的大名一样,不喜热闹。我把走近钱锺书的希望放在杨绛先生身上。当《东方纪事》创刊号面世时,我们从中国作协花名册上找来钱先生的地址,试着给杨绛寄杂志,并附一封信,推销自己和刊物,恳请赐稿。他们伉俪是江苏人。我打乡情牌。杨绛先生温良恭俭让,复信鼓励。打那以后,逢年过节不忘寄贺卡、送本挂历什么的,嘘寒问暖作感情投资。记得她收到我寄的《蒋碧薇回忆录》后,十分高兴,说大家都争着看,未及她读完,被友人借去先睹为快了。我投其所好,马上又寄一本,哄得老太太再三鸣谢;渐渐地,我在致她信中都附上一笔问候钱先生。她的来信也缀上“钱书附笔问候”。

次年,社里拟出版一本《名人忆往》集子,内收有钱、杨的作品,我请杨绛代转一函给钱先生,委请他为该丛书题签。钱先生复信云:“十分惭愧我承你品定为‘名人’,那证明我主观上虽不想‘欺世’,而客观上已经‘盗名’了。”他又以他的书法很糟和右拇指患腱鞘炎掣痛不能握管谢绝。信写得极其温和,诚挚感人,活脱脱的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形象,明明是拒绝了,也没让你觉着丝毫的不舒服。

那时,钱锺书热正在全国逐渐形成。花城版《钱锺书论学文选》已问世,《围城》正一印再印,传媒说要拍电视剧。鉴此我向社里提出出版《钱锺书全集》,选题通过。我请纓上钱府攻关,想走近钱锺书。第一次拜见老先生,又请他授权出书总不能光着手。适逢江苏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版20卷本《清诗纪事》,亦算家乡的“土特产”,讲得出口,拿得出手,再合适不过的。一套《清诗纪事》,一堆庞然大物,我一个人折腾不了,邀同人迎春君偕行,兴冲冲进京。早闻钱先生杜门谢客,钱门由杨绛老太太当关。我们决定不打电话,直闯三里河,那天没有打到车,那包十多公斤的《清诗纪事》,真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三步一歇,五步一停,时值隆冬,两人还是忙得大汗淋漓。田君打趣地说我们这是往麦加朝圣。当我们气喘吁吁地扛着这包书爬上钱寓楼梯时,我兴奋地想到下次来时扛的是《钱锺书全集》样书,那一定轻松愉悦百倍。

敲响门铃,杨绛头发花白,戴着细边眼镜,打量着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我先行一躬,再自报家门。“哦”,杨绛一听想了起来,笑脸相迎。请坐、上茶,寒暄。我伺机打量一下钱宅,偌大客厅,空屋不见人,钱先生一定是听到电铃声吓跑了。室内窗明几净,厅内只有一幅中堂,案几上陈着笔砚。好像只有两只书柜,并非坐拥书城(他们夫妇是功夫在书外)。两只单人沙发,朴素、简洁得一如主人清淡、典雅的风格。

我说这次进书组稿,社领导让我们顺道看望一下两位先生,捎上家乡新出版的《清诗纪事》,供先生消闲。杨绛听着淡淡一笑,指指书橱,“有了,有了。”客套一番之后,我便开始游说,提出拟出

版《钱锺书全集》的构想,从意义讲到操作细节。杨绛微笑着安详地倾听后,她先表示谢意,后又委婉的说这要听钱锺书本人意见。

在京组稿待了数日,当我回到出版社上班时,钱先生的信已静静地躺在案头。

不才两月以来,身心交瘁,遵医嘱,终日偃卧,大驾来失迎,歉憾之至!《清诗纪事》颇多采及拙著,故苏州大学主编者曾以全部向赠;复蒙惠赐,虽“好物不嫌多”,然“与友朋共”,即以贻一学人。借花献佛,而饮水思源,不敢忘,尊锡也。特此致谢。倾获大函,语重意厚,感愧感愧!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第一概坚辞,……且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弟所睹一切全集,其中值得存者往往不过十之五六……(1993年2月1日致笔者函)

堡垒没有攻破。在一切向“钱”看的热潮中,社里组织到一部《钱锺书传》,社里希望钱先生能过目认定,社长又动员我去说项。这本是一件令传主尴尬的事。因社里的事推不脱,我硬着头皮给钱先生写信,细述我社的一些想法,钱先生马上回信云:“年来弟不幸已成新八股文题目,颇多借‘题’著书者。欲为弟撰传记者忆有两三人,弟皆谢绝‘合作’,请其罢休……杨绛衰病,无气力审读此类著作,然此传既未得‘传主’本人同意,作者岂‘文责自负’耶?倘失实过多,迹近造谣诽谤,将来涉讼,亦未可保耳……弟等差有自知之明,不愿灾梨祸枣,亦皆婉谢。不识抬举,辜负盛情,既疚且感。”接读先生来信我惶恐不安,建议社长尊重先生的意见不出了。社里不听,将书印了出来。杨绛此前另有信相托,要我坚决“劝阻此书出版”。我只能负荆请罪,寄上样书,等着挨“剋”了。不日,钱先生复信严厉地批评“传”中“因道听途说失实之处”“张冠李戴”或穿凿附会多处,“令人啼笑皆非”……让我铭感五内的是薄末两句:“木已成舟,书已出版销售,薄利微名已赚”,“置之一笑可也”。钱先生批评得有理有据,言辞中肯,只“置之一笑”,并未要“对簿公堂”,显出一种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大风范。

我曾先后到钱府拜访三次,多么想走近钱锺书,一睹先生的风采。我世俗,先生脱俗,注定我无法走近他,无缘一面。但从《钱锺书传》出版前后先生致我的两封信,对出版社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体现他的宽容、大度,让我走近了他,理解他,更敬爱他。

多年来,我梦想走近钱锺书,就是走近。诚如哲人所言,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显珍贵吧,故记之。

选自《我为他们照过相》

遇见好书

悦读专栏QQ交流群: 717541323